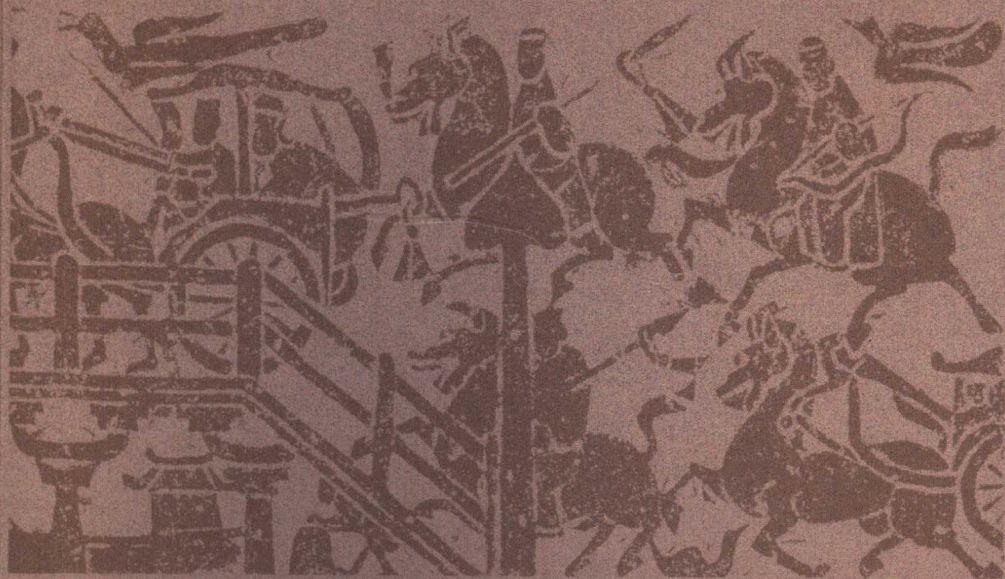


《孫子》十三篇 綜合研究

李 零 著



中華書局

《孫子》十三篇 綜合研究

李 零 著



中
華
書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孫子》十三篇綜合研究/李零著. —北京:中華書局, 2006

ISBN 7-101-04823-4

I. 孫… II. 李… III. 孫子兵法—研究
IV. E892.2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100182 號

書 名 《孫子》十三篇綜合研究

著 者 李 零

責任編輯 樊玉蘭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印刷廠

版 次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張 30¼ 插頁 2 字數 420 千字

印 數 1—40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7-101-04823-4/K·2067

定 價 58.00 元

吳孫子發微

張苑峯



圖一 張苑峯師題簽

曰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輕之以五效之以計以索六請一曰道二

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者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民弗詘也天者陰陽寒

暑時制也順逆兵勝也地者高下廣狹遠近險易死生也將者知

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

孰能天地孰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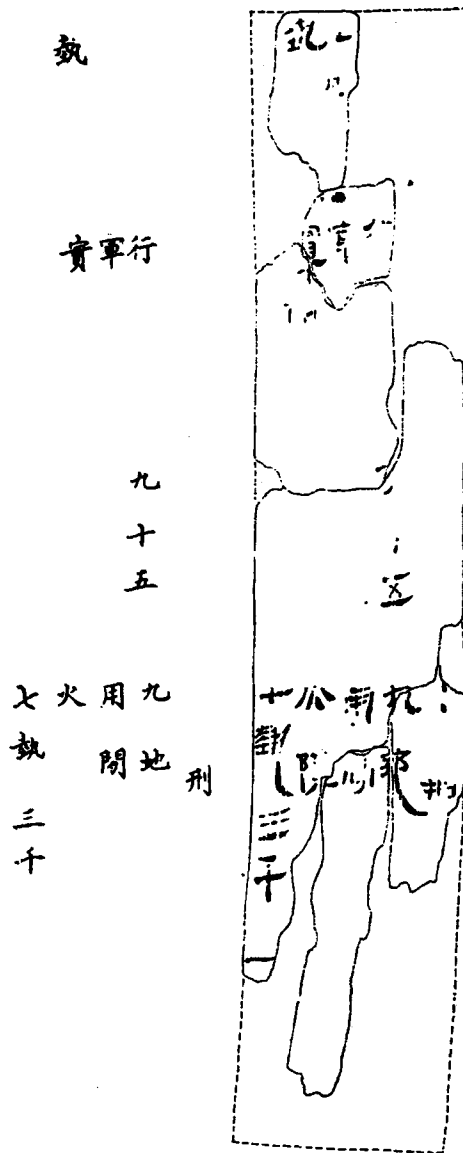
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

計用之必勝

用而視之不用近而視之遠而視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貴

之強而之怒

圖二 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



圖三 簡本《孫子兵法》的篇題木牘

國弱月不戰也君之取
之不可進而謂
以退而謂之退是
中之事而同軍中之
三軍之任而同三
矣也軍士既惑
已至矣是謂亂軍
五知可以戰之不
之用者六上下同
不御者勝以實得
足者勝之道也扶
殆不知攻而知己
不知己每戰必殆
先為不可勝以待

圖四 新疆吐哈溝出土六朝抄本《孫子·謀攻》
(日本龍谷大學學術情報センター大宮圖書館所藏)

第十三

第十五

敘兵

開敵勿周圖師量無外被敵攻取之勢報道及知重火攻

第十四

因機設備多方謀之先取攻其心奪勝計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故經之以五校之

計而索其情

謂下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今人與上下同意也

謂道之以政令

謂道之以德教也

故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人不危

存亡之端不與敵危之敗若晉陽之圍張武生對今無後疑心全

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

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而況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易見也凡

用兵之法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眾舉矣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

兵挫銳力屈貨殫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

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

兵閒拙速

以速勝未觀巧之久者也

故善用兵者役不再

藉糧不三載

藉清賊也言切賊人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運因食

取用於

國因根於敵故軍食可足

兵久而

國利者未之有也

不盡知

孫子卷上

始計第一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彊士卒孰

魏武帝註孫子卷上

始計第一

一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計於廟堂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

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下五事

我之一曰道謂導之以教令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

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

愛所以兼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

勇嚴也德備五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

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

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同聞知

大子孫子卷上

圖八 《平津館叢書》影印《魏武帝註孫子》

上海圖書館藏

一家註孫子卷上

計篇

廟堂也○李荃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利卒遠近險易計以

計神加德官以斷主客成敗故孫子論兵亦以計為篇首
○杜牧曰計算也曰計算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地
將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算優劣然後定
勝負勝負既定然後與師動眾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
著為篇首耳○王皙曰計者謂計主將天地法令兵眾士
卒賞罰也○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境故
用兵之道以計為首也或曰兵貴臨敵制宜曹公謂計於
廟堂者何也曰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地之遠近兵之眾寡
安得不先計之及乎兩軍相臨變動相
應則在於將之所裁非可以踰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故

圖九 宋本《十一家註孫子》

嚴妻龔氏歐悅婦張氏悅婦張氏

憂
懷
憂
懷

𪔐𪔑𪔒𪔓𪔔

翰荒

張在教敵

叢叢毖薊

義聚部情共律納
痛 委謹謝情共律納

銷
郎
茲
竊
敢
繼
庸
叢
絳
繡
龍
璫
璫
錦
帶
那
情
獨
病
魂
飛

[illegible]

痛報續續痛移散株妮慨震殺終

辨愾叢穉愴霰嶺霰
嶺霰則發

義聚諸行散報解此請改穀賜妻諸諸能解

[illegible]

帝
 臣
 張
 翥
 履
 繼
 肅
 祚
 穀
 懋
 純
 煥
 耀
 一
 統
 保
 萬
 年
 之
 業

萌
 叢
 蘊
 好
 芝
 蜂
 屈
 龍
 并
 散
 飛
 瓶
 拜
 練
 頭
 飛
 雙
 社
 龍

自序

中華書局是百年老店（準確地說，是創辦 93 年的老店），金字招牌，整理印行古籍，堪稱海內第一。當年，還是中學生的我，每次坐 103 路無軌電車，路過它和商務印書館共用的那座辦公樓，都要回頭留戀地張望，感到神秘和羨慕。萬萬想不到的是，後來我能在這裏出書，不是一種，而是好幾種。現在，我終於可以說，我是它的老讀者，也是它的老作者。我很自豪。

本書是由我的兩本舊作合編而成，一本是中華書局 1997 年出版的《吳孫子發微》，原來是收入《中國古典名著譯注叢書》；一本是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的《〈孫子〉古本研究》，原來是收入《國學研究叢刊》。這兩本書，本來是同一部書稿，前書是我整理的《孫子》讀本，包括校釋和翻譯；後書則是提供讀者作進一步研究的文本資料，以及我歷年發表的有關論文。1986 年，我把書稿交付中華書局，書太大，編輯建議我一分為二。我忍痛把它們拆開來，一部分留在中華，一部分另尋出路。後者，我聯繫過齊魯書社，袁行霈先生說，你最好還是支持咱們北京大學吧，所以後來是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現在我把這兩本書合在一起，合在一起才是本來面貌。它們的寫作可以追溯到 70 年代中，但正式出版是在 20 多年後。我是鼠年（1948 年）出生，無名鼠輩。當年，發表文章不易，出書更難，這很正常。更何況，當年的中華書局，門檻高，壓稿多，出書慢是出了名的。

我對《孫子兵法》研究有年，但主要集中在 1974—1979 年。它是我初入學術之門的習作、少作、處女作，很多事值得紀念。

第一，我是靠它找到飯碗，從此吃上學術飯。1968 年，我們這代人，中學畢業，無學可上，下鄉修地球。插隊七年，我在農村讀了不少書，沒有目標，沒有目的，屬於“無聊才讀書”。《孫子兵法》，我中學時就讀過，非常喜歡。1974 年，銀雀山漢簡出土。地下出土最古老的文本，讓我好奇。我開始迷上它。1975 年底，回到北京，我無事可作，我父親也無事可作（他是問題擱置無人過問的“黑幫”），爺倆一塊兒鑽圖書館，主要是上首都圖書館。北大圖書館也蹲過。凡是與《孫子》有關的書，我都讀，並把讀書心得寫成文章。我的文章還很稚嫩，但幾

位前輩看過，非常欣賞，推薦引介，不遺餘力。當時幫我的人主要有五位，恩重如山，永遠忘不了。一位是當過首都圖書館館長的程德清先生，一位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侯大謙先生，一位是中央美術學院的常任俠先生，一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劉仰嶠先生（當時是副院長），一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夏鼐先生（當時是所長）。這些先生，可惜都不在了。沒有程先生的幫助，我無書可讀，也不知道怎麼找書。沒有侯先生，我不會認識常先生。沒有常先生，我不敢叩文物考古部門的大門。沒有劉先生和夏先生的幫助，我不可能進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我進考古所是1977年。那年1月，劉先生把我的文章交給夏先生，夏先生讓考古所把我的文章轉給銀雀山漢簡整理組。4月，整理組回信，對我提出的意見表示感謝，並送我一本剛剛出版的普及本，說有些問題，普及本改了，有些還來不及改，祇能等將來出精裝本再改（據裘錫圭先生後來講，信是他讓寫的）。後來，好像是秋天吧，夏先生叫我去。他說，所裏有兩項工作需要人，一是為編寫《殷周金文集成》準備資料，二是參加《小屯南地甲骨》的整理工作。我跟負責前者的王世民先生見面，經過當面測試，他接受了我。

第二，我是靠它取得古文獻學的訓練。現在，我印名片，總是在“教授”二字底下注明我的專業領域：考古、古文字、古文獻。除此之外，什麼頭銜都不印。這是我從美國學者那裏學來的做法。考古和古文字，是我在考古所讀研究生時所學，古文獻則是自學。我的正經專業是考古學，但1983年我離開了考古所，1985年調到北大，並不在考古系。我的工作單位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我在這個專業教學生，但人不是北大畢業，也沒有學過古文獻專業。我是70年代學考古和古文字之前，通過整理《孫子》，才逐漸明白，什麼是目錄學，什麼是版本學，什麼是校勘學，什麼是辨偽學，以及輯佚方法，等等。《孫子》是我練手的東西。《孫子》祇是一本書，中國典籍，浩如煙海。說實話，我沒有宏大志願，一本一本又一本，不斷整理下去。相反，我的感受是，整理古書太累，如無特殊需要，就到此為止吧。對我來說，這一段值得回憶，最大收穫是，借助一本書，我可以把所有訓練，從頭到尾過一遍。親自動手幹中學，印象特別深。這對我後來的研究幫助很大，對我研究考古和古文字幫助很大。我們都知道，學術有分工，疆界很分明，但問題本身，往往無分工，也沒有疆界，帶有綜合性的大問題更是如此，就像動手術，經常是各方會診。張光直先生說，三代無學科，我欣賞。個人對付大問題，能力有限，貴在舉一反三，眼界要廣，會節省精力。對我來說，

整理《孫子》，方法論的收穫要比整理本身更重要。我治古文獻，是從簡帛古書入手，這使我對古文獻的理解，從一開始就與狹義的古文獻研究有所不同。我很感謝那一段的研究。

第三，當年改文章，我請教過很多人，如北京大學歷史系的齊思和先生。但真正幫我改文章，是三位年紀比他輕的老師，俞偉超、李學勤和裘錫圭。我還保存著他們幫我改文章的信。俞先生是中國最好的考古學家，李先生和裘先生是中國最好的古文字學家。他們幫我改文章，對我來說，是境界提升。他們都是很有學問也很有經驗的人，有經驗和沒經驗就是不一樣。我從他們那裏學到很多東西。他們三位中，我認識最早是俞老師，還在進考古所之前。帶我拜謁俞老師，是他的學生張承志先生，當時他還在作考古。俞老師的特點是熱情奔放，富於想像力。他對我的幫助，主要是精神感染。這種感染，比他的修改還重要，我叫“第一推動力”。現在，俞老師也不在了，我很懷念他。

研究古文獻，我的體會是，方法的問題很重要。整理《孫子》，整完也就完了，真正能夠留下來，可以推而廣之和繼續思考的問題，主要還是方法。

過去，研究《孫子》，文獻研究的基礎很不夠。我希望通過這本書，摸索出一套整理古文獻的基本方法，可以反映最新研究特點的方法。

我想，如果讓我整理一本古書，有六個方面不能不考慮。

（一）我也是從考著錄入手，既包括徒存空目的漢唐史志，也包括可與宋明版本對證的晚期史志和私家藏目。但我理解，這並不祇是爲了定存佚，辨真偽，而是爲了尋找文本演變的綫索。余嘉錫先生指出，沒有著錄，不一定就沒有；佚而復出，也不一定就是偽書（《古書通例》）。受出土文獻啓發，我提出過，最好是用古書年代學代替辨偽學。年代學可以涵蓋辨偽學，辨偽學不能涵蓋年代學。過去編過《續偽書通考》的鄭良樹先生，後來也提出類似的說法。

（二）以著錄爲綫索，我們應全面搜集文本。第一，是看有沒有早期的古本，如戰國秦漢時期的竹簡本或帛書本，或者年代更晚的敦煌本、吐魯番本，有，一定要把這一部分整理好，拿它當“古書一條龍”的“龍頭”。第二，是要全面搜輯古書中的有關引文，古書要一本一本“過篩”，今本有也好，沒也好，都要一次性地把它們找出來，不能輯存、輯佚分開搞，輯出來再分存佚，輯出的引文，還要分早晚，儘量按時代先後排順序，這是“古書一條龍”的“龍身”。第三，是爲宋明以來的版本排世系，誰是爺爺，誰是兒子，誰是孫子，要畫出版本的演變樹譜，這是

“古書一條龍”的“龍尾”。這件事，過去最累人，現在有電腦，效率大大提高。

(三)畫版本樹譜，目的不是為版本而版本，為這些版本辦博物館，把所有版本堆在一起，不分先後，不分系統，鋪天蓋地，每個字都對一遍，好像出版社和印刷廠那樣的校對工作，而是為了找出典型版本，汰除次生版本，從根子上而不是枝梢上解決問題。宋以來的版本，後出的本子，異文多屬誤刻，和早期的本子相比，不但差異小，重要性也差，篩選很有必要。如果不是這樣，典型版本已經有了，還要和次生版本一一對比，等於折磨讀者，也毫無用處；或者一開始就沒有鑒別，底本是次生版本，後來找到典型版本，校是倒着校，也是捨本逐末。

(四)校勘，也是為了研究文本的演變。堆積版本，全面考異，固然不必要，為了提供讀本，擇善而從，也不可取。因為其所謂擇善，很多都是基於義理，主觀去取，不能反映文本的客觀演變，百衲衣式的拼合各本，也是破壞文本原貌。我的經驗，“好不好”不等於“早不早”，今本經歷代增飾，順應當時的閱讀口味，一般都比古本顯得更“文通字順”，好像更合理，這和古書原貌完全是兩碼事。

(五)注釋，是在全面校勘的基礎上進行，但全面校勘可以放在注本之外，主要是橫豎對比，就像考古學使用的器物類型圖。注本對校勘成果要適當簡化，祇涉及影響文義理解的關鍵之處，主要側重於名物的考證和文義的疏通，不一定字字解釋，很多地方的理解可以藉翻譯為彌補。

(六)輯佚，應該是輯錄古書引文的副產品。一部好的整理本，這個部分不可缺。古書引文，光從書名看，果出此書與否，或不易遽定，張冠李戴時有之。但鑒別的原則是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疑似之間，不易去取，宜寬不宜嚴。寬，可存疑待考，俟確有證據，再去也不遲。嚴，則扔掉了，再也找不回，無法彌補。

說到上面的總結，我還想到一位前輩，如今也是古人，這就是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的楊炳安先生。1959年，中華書局出版過楊先生的《孫子集校》。我當中學生時就讀過這本書，書是一個同學送我的，現在還珍藏在家裏。楊先生的工作是全面搜集版本，對各本異同作全面校勘。1986年，我寫過一篇《關於〈孫子兵法〉研究整理的新認識》，本書的論文裏有這一篇。在這篇文章裏，我批評過楊先生。我說，他對孫星衍的評價，對類書引文的評價，以出土發現看，正好是講反了，全面校勘，也過於繁瑣。當時的我，也像現在的很多學者，年輕氣盛，自以為高明。但現在回想，我的評價，其實不夠公允。因為我對楊先生的批評，正是